

# 斯里兰卡“佛足迹图”的 考察与初步研究\*

## ——以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为中心

霍 巍

**内容提要** 斯里兰卡是佛足迹图流传甚广的一个区域，也是佛足迹图传播路线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其图像具有独特的纹饰与风格。以往见诸著录的佛足迹图像资料不多，且往往缺乏考古出土背景，本文结合斯里兰卡古都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4—8世纪佛寺遗址考古发现的佛足迹图，可以更为清楚地观察到斯里兰卡佛教文化中此类图像的流行情况，并有助于了解我国唐代佛足迹图的来源及其传入路线等。

**关键词** 丝绸之路 佛足迹图 佛教考古 佛教美术 师子国

DOI:10.16319/j.cnki.0452-7402.2020.03.002

佛足迹图是佛教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题材，在佛像出现之前，佛足迹和作为释迦牟尼象征的座椅、托钵及菩提树等象征物，开始一同在印度出现。即便是佛像出现之后，佛足迹图依然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佛教“圣迹”继续流行，其影响遍及南亚、东亚各地，在印度、中国、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遗存有大量不同时代的佛足迹图。斯里兰卡的佛足迹图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研究者加以留意，但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因此笔者拟结合实地考察所获资料，略作补充与分析。

### 一 关于斯里兰卡佛足迹图的研究现状

斯里兰卡古称“师子国”“僧伽罗国”，宋代以后也称为“细兰”，明代译为“锡兰”，1972年改称为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历史上也是佛教流行的国家，我国东晋高僧法显曾巡游此国，并在此住过两年。从总体而论，以往的佛教美术研究者主要的关注点还是集中于佛像、壁画等主流研究领域，较少有专门对佛足迹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四川新出土南朝造像的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222）的系列成果之一。

图展开研究的。就笔者目力所及，过去日本学者对于日本药师寺的佛足迹图作过比较集中的研究<sup>〔1〕</sup>，中国学者对于我国境内发现的佛足迹图有过关注<sup>〔2〕</sup>，斯里兰卡学者在其著述当中对佛足迹图也有过零星的收录<sup>〔3〕</sup>。除此之外，对此进行的专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

国内目前对佛足迹图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这一问题作过系统研究的有李静杰先生，他在论文中对印度各地以及南亚地区的佛足迹石作了概述，其中也涉及到斯里兰卡的佛足迹图<sup>〔4〕</sup>。他提到，日本学者丹羽基二曾历时20年，足迹遍及亚洲佛教流行的大部分地区，收集到约2000件佛足迹资料，其中斯里兰卡占半数以上，日本300件左右。丹羽基二从中遴选近200件典型佛足迹图像进行研究性解说，出版了《图说世界的佛足迹石——佛足迹石所见佛教》<sup>〔5〕</sup>。李静杰通过这一图册引述了丹羽基二对于斯里兰卡佛足迹图的主要研究观点，并对其加以批评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佛足迹石出现的年代。丹基羽二认为，似乎在公元前5世纪，来自印度次大陆的移民已经将佛教带入斯里兰卡，进入1世纪以后，随着佛陀偶像的出现，作为佛陀象征的佛足迹石必然衰落，因此，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应为佛足迹石制作与信仰的极盛时期，所以斯里兰卡存在着世界上最古老的佛足迹石，而且包括了佛足迹图的所有类型。李静杰则认为，丹基羽二的观点存在严重问题。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斯里兰卡已经传入佛教，在此之前更不会出现佛足迹石，其发生时间应不早于2世纪，斯里兰卡最初形象大概就是故都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所见到的佛足迹石，且与东南印度丰富多样的佛足迹石相似。

第二，是佛足迹石的类型演变关系。丹羽基二将斯里兰卡的佛足迹石划分为无纹筒略型、无纹加伞盖型、刻画法轮型、刻画法轮加伞盖型、长脚趾型、多种纹样型、网格纹样型7种，呈现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演变关系。而李静杰则认为，很可能在斯里兰卡最早出现的复杂纹样的佛足迹图，最初都是由东南印度传来，尔后随着佛足迹石的大量制作，图样刻画便趋向简略，并不存在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关系。

---

〔1〕 [日] 斋藤理惠子：《佛足石》，收入大桥一章、松原智美：《药师寺千三百年的精华——美术史研究のあゆみ》页270—271，裏文出版社，2000年；[日] 三宅米吉：《佛足石》，《考古學雜誌》第1卷7期，明治三十年；[日] 保阪三郎：《西京药师寺佛足石》，《國華》第755期，1941年；[日] 橘健二：《药师地佛足石銘文存疑》，《南都佛教》第6期，1959年；[日] 加藤諄：《佛足石——日本における》，《古美術》第24期，1968年；[日] 广冈义隆：《佛足石記》，上代文獻をよむ會編：《古京遺文注釋》，櫻楓社，1988年；[日] 斋藤理惠子：《佛足石紀校訂》，安田暎胤、大桥一章编《药师寺》，裏文出版社，1989年；[日] 斋藤理惠子：《药师寺佛足石の來歴について》，《美術史研究》第三十七卷，1999年；[日] 大桥一章、松原智美编著：《药师寺千三百年的精华——美术史研究のあゆみ》，页272—276，裏文出版社，2000年。

〔2〕 韩伟：《陕西的佛足造象（像）》，《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3〕 T.G.Kulatunge, *Abhayagiri Vihara at Anuradhapura*, Ministry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lombo, 1999; Chandra Wikramagamage, *Art of Lsurumuniya*, Tharanjee Prints, 2004.

〔4〕 李静杰：《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4期；同氏《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下）——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5期。

〔5〕 [日] 丹羽基二：《圖說世界の佛足石——佛足石から見た佛教》，东京：名著出版，1992年。

第三，是佛足迹石的放置使用方法。丹羽基二调查认为，斯里兰卡期的佛足迹石，通常放置于塔的四方或四方中的某几个方向，一般表现为双足，脚趾朝向外方，以便于佛教信众顶礼膜拜。对此李静杰表示赞同，认为这和法显游历斯里兰卡所记载的情况相一致。

但是，李静杰在文中仅仅引用了一方采自丹羽基二书中的斯里兰卡佛足迹石，注释中表明其来自斯里兰卡古都阿努罗陀补罗<sup>〔1〕</sup>，这对于我们认识斯里兰卡佛足迹图的基本样式尽管很有帮助，但是还远远不够，更无法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利用在斯里兰卡进行考古工作之便，对古都阿努罗陀补罗境内的两处佛教遗址吉特瓦纳（Jetavana）、阿比亚吉里

（Abhayagiri），以及斯里兰卡贾夫纳考古博物馆（Archaeological Museum Jaffna）、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斯里兰卡国家考古局、凯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Kelaniya）考古系标本室等处收藏的部分佛足迹石进行了实地考察，观察并收集了部分相关资料，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图一〕Jet1



## 二 斯里兰卡考古发现的佛足迹石

斯里兰卡的佛教考古遗址中存在有大量佛足迹石，现均收藏于各地的博物馆、大学和考古研究机构之内，笔者对其中部分藏品进行了调查。由于斯里兰卡各地的文物管理与保护制度的不同，一些收藏单位许可进行拍摄和测量，而另一些单位则不允许，所以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并不完整。不过，即使是在对现有资料所做的观察当中，也可以发现斯里兰卡佛足迹石的若干新信息和新线索，现分述如下：

### （一）吉特瓦纳（Jetavana）遗址博物馆

吉特瓦纳（Jetavana）遗址博物馆位于斯里兰卡古都阿努罗陀补罗境内东南部，主要收藏这一古代佛教遗址内围绕吉特瓦纳大佛塔考古所出土的文物。目前该博物馆展出有数方佛足迹石，现分述如下（均编号为Jet）：

Jet1：正方形，高61厘米、宽61厘米、厚12厘米。雕刻图案为一双足迹，两足中央雕有立柱，立柱上

〔1〕 前揭李静杰《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图三十二。



〔图二〕Jet2



承华盖，华盖之下为并拢的双足，掌心、足跟和十指均平滑无纹〔图一〕。

Jet2：长方形，高73厘米、残宽46厘米、厚9.5厘米。因石质风化严重雕刻图案已漫漶不清，仅在一侧边缘隐约可辨出立柱，上承弯曲状的顶盖，在凹下的方框之内刻有一双足迹，掌心雕为车轮状，象征佛教典籍中的“千辐轮”，每轮有11根辐条。足跟和十指部以及整个足掌上均雕刻有图案，但已无法辨识细节〔图二〕。

Jet3：正方形，高60厘米、宽60厘米、厚5厘米。图案纹饰与Jet1大体相同，但较为轻薄，两足中央的华盖在样式上稍有变化，盖体稍狭，华盖两边有下垂的花蕾状纹饰。双足平滑无纹〔图三〕。

Jet4：近正方形，高46厘米、宽50厘米、厚6厘米。在一方薄石板上雕刻而成。两足中央雕立柱，上承以华盖，盖体较宽大，有明显凹槽。华盖之下雕一双佛足，十指并拢，后跟圆润。因漫漶太甚，足掌上是否雕刻有图案纹饰已无法确定，但结合前举Jet1、Jet3两方佛足迹石的情况来看，很可能原来也属于无纹饰的一类〔图四〕。

〔图三〕Jet3



Jet5：近正方形，高77厘米、宽81厘米、厚14厘米。图案带有两重方台，正中为一双佛足迹，脚心部位刻出轮辐，每轮刻出15根辐条。十指上原似刻有花纹，但已辨识不出。足后跟部转角圆滑，没有雕刻花纹。在两个足印的中央雕有立柱，上承托木，托木上方为华盖。另在立柱的两侧还各有一长茎的植物升出，花蕾随华盖的下缘线向两边张开〔图五〕。

Jet6：此石原为建筑遗址上出土的石构件残段，残高120厘米、宽59.5厘米、厚34厘米，上方带有石榫头可与其他建筑构件相插接。通体均有雕刻图案，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一组连弧纹和连珠纹组成的装饰性图案，下段为两组上下相接的团花纹饰，每组均由忍冬纹环绕。图案的中心位置，即圆形的带有仰、覆莲纹的莲台之上，雕刻出一对佛足印，其上有华盖笼罩。足印略向外张开，平滑无纹〔图六〕。

上述佛足迹石均展出在博物馆外廊道内，可以进行拍摄和



〔图四〕Jet4



〔图五〕Jet5



测量记录。此外，在该博物馆的展厅内，还陈列有两方佛足迹石，但未获准拍摄。经观察，其中一方佛足迹石的形制和图案与上述Jet1、Jet3相似，尺寸也相近；另一方形体较大，但图案纹饰较为简单，除一双足迹之外，未见其他装饰图案。

## （二）阿布亚吉里（Abhayagiri）纪念馆

阿布亚吉里（Abhayagiri）为梵文音译，意为“无畏山”。1992年，为纪念摩诃帝沙以及曾在此地修行两年的中国高僧法显，中国政府捐资兴建了“纪念摩诃帝沙—法显文化馆”，并设有文物陈列室，收藏有4块佛足迹石，现分述如下（均编号为Abh）：

Abh1: 正方形，长62厘米、宽62厘米、厚16厘米。呈平板状，雕刻出佛足迹一双，足掌中心刻有一个圆形的轮辐纹，轮上有多条辐条，构图简单，基本不见其他纹饰。

Abh2: 略呈椭圆形，短径70厘米、长径78厘米、厚18厘米。中心刻出一双佛足迹，足掌中心刻有圆形的轮辐纹，轮上可见多条辐条，构图较为简单。

Abh3: 长方形，长86厘米、宽71.5厘米、厚8厘米。此图的构图较为独特，两足分开，前掌较宽大，后掌向内收缩。双足均在近足跟部刻出一个轮辐纹，轮辐上有30条辐条，在两个足掌的中心各刻有一个较小的轮辐纹，上有16根辐条，在掌心与十指之间还刻有图案，但因石质风化严

〔图六〕Jet6





〔图七:1〕Abh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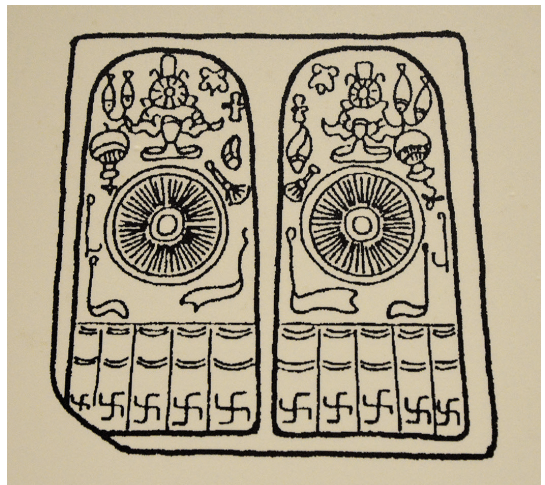
〔图七:2〕Abh3-2



〔图八:1〕斯国博1



〔图八:2〕斯国博1摹本



重，图案已不甚清晰〔图七：1〕。根据以往斯里兰卡方面公布的图片资料〔图七：2〕，可以隐约判断掌心之下的图案为佛教的“三宝标”纹饰。

Abh4: 长方形，长139.5厘米、宽54.5厘米、厚28.5厘米。此图的构图与Abh3相同，只是形体较大。在足掌近后跟部刻有一个较大的轮辐纹，掌心处刻一较小的轮辐纹，下方所刻似为“三宝标”的纹饰。

受斯里兰卡各地的文物法规所限，上述各佛足迹石也未获得拍摄许可，但允许进行测量与记录，故现有资料中有Abh3有图片可资参考，其他各方足迹石只有测量数据和基本情况描述。

### （三）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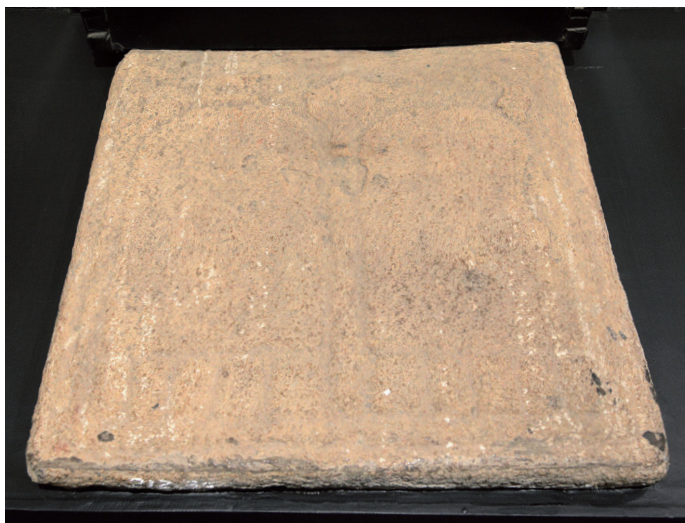
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位于首都吉隆坡，该馆内收藏有六块佛足迹石，全部出土于斯里兰卡古都阿努罗陀补罗境内的佛教遗址中，馆内允许进行拍摄，但无法进行测量，故只能提供相关图片资料，现分述如下（编号为斯国博）：



〔图九〕斯国博2



〔图十〕斯国博3



斯国博1：略为正方形，尺寸不详〔图八：1〕。石上所刻图案较为复杂，一双佛足迹呈长方形条状，中心刻有一个轮辐纹，上刻有数十根辐条，十指均刻出指节，大姆指和各指指尖上刻有卐字符号，均呈顺时针方向。足跟位置上刻有双鱼、宝瓶、宝剑、海螺和三宝标等图案，纹饰较为模糊，只能依据摹写的图稿〔图八：2〕加以辨识。此佛足迹石出土于古都阿努罗陀补罗北方的瓦武尼亚（Vavuniya）区，标识文字说明其年代为“公元2—3世纪”。

斯国博2：近正方形，尺寸不详。图案较为简单，为浅浮雕手法刻出的一双佛足迹，双足平行并立，足跟部呈圆弧状，原似有阴线刻的图案，但因风化过甚已无法辨识〔图九〕。

斯国博3：近正方形，尺寸不详。图案与前述出土于古都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佛教遗址吉特瓦纳（Jetavana）佛塔附近的佛足迹石相同，中央刻有一竖立的立柱，立柱上方承一华盖，石板较薄，足迹的边缘轮廓线刻得较深，足上因风化过甚无法观察到是否刻有其他图案纹饰〔图十〕。

斯国博4：略呈“亚”字形，尺寸不详。此石上刻一双并拢的佛足迹，双足平行，前掌呈长条状，后跟为圆弧形，十指刻出指关节，由于风化严重，无法观察到原来是否阴刻有纹饰图案。双足中央雕一立柱，上承一华盖，华盖为双线条的长条形，华盖中央可观察到上举的柱头〔图十一〕。

斯国博5：近正方形，尺寸不详。石板较薄，四周刻有边槽，石上刻一双佛足，佛足前掌呈长条状，后跟部呈圆弧状，纹饰不清〔图十二〕。

斯国博6：近正方形，尺寸不详。图案也与吉特瓦纳（Jetavana）遗址佛塔所出的佛足迹石相似，刻有一双平行并拢的佛足迹，双足呈长条状，足后跟呈圆弧状。在双足的中央，刻出一立柱，立柱上承华盖〔图十三〕。

〔图十一〕斯国博4



〔图十二〕斯国博5



#### （四）凯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Kelaniya）考古系标本室

凯拉尼亚大学考古系标本室内收藏有一方佛足迹石，此石保存情况较差，风化严重，可观察到石板的四周刻有三层向上递升的边槽，

〔图十三〕斯国博6



〔图十四〕凯大1



如同须弥座，其上刻出一双并拢的佛足迹，佛足迹外刻一道方框相围绕（编号凯大1，〔图十四〕）。

#### （五）斯里兰卡国家考古局Oyamaduwa佛教遗址

斯里兰卡国家考古局主持发掘的Oyamaduwa佛教遗址内，也曾出土一方佛足迹石，据该局考古处提供的发掘简报，此方佛足迹石出土于遗址内一座建筑台基前方，出土时已风化严重，可观察到此石的形状略呈长方形，石上刻有佛足一双，足掌呈长条形，足后跟为圆弧形，足上是否原刻有纹饰图案已无法确定（编号Oya1，〔图十五：1〕）。从发掘简报中发现的一个重要线索是，此处建筑遗址为一方形的台基，上面建筑有一座圆形的佛塔，塔体已残，塔前方设有台基，台基上残存有数步踏道〔图十五：2〕，而这方佛足迹石出土的位置即在踏道的一侧，这为我们判定佛足迹石的供奉及礼拜方式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 （六）贾夫纳考古博物馆（Archaeological Museum Jaffna）

贾夫纳位于斯里兰卡西北海岸，在一处名为“Kathurugda Ancient Vihara”的佛教遗址中出土一方佛足迹石，现收藏于贾夫纳考古博物馆。此石尺寸不详，带有方形的底座，图案为一双并拢的佛足迹，足掌中为较大的圆形轮辐纹，上刻有数十根辐条，足跟部刻有由W形的三叶状物和圆形轮状物组成的“三宝标”纹，十指前端指节上均刻有花纹，足指与足心轮辐纹以及足跟部还阴线刻有海螺、宝瓶等纹饰，但多已漫漶不清（编号Jaff1，〔图十六〕）。

### 三 佛足迹石的年代与类型

上述斯里兰卡考古出土的佛足迹石，虽然仅仅是斯里兰卡众多佛足迹石遗存当中的极少部分，但因其发现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斯里兰卡佛教文化最初的发源地——古都阿努罗陀补罗最为重要的佛教遗址内，因而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下文将就这些佛足迹石的年代与类型作一初步探讨。

首先是年代问题。上述这些佛足迹石均是从佛教遗址中出土，所以要判断其年代，就要对相关佛寺遗址的历史背景及兴建年代的上、下限有所了解。这里所涉及到的佛教遗址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吉特瓦纳（Jetavana）遗址和阿布亚吉里（Abhayagiri）遗址。

吉特瓦纳遗址以大佛塔为中心，创建于古斯里兰卡国王马哈色那（Mahasena，公元270—303年）时期，是斯里兰卡历史上三处著名的小乘佛教修行圣地之一。它位于古都阿努罗陀补罗的东南部，相传最初是公元前3世纪由来自印度的阿育王之子建立，“Jetavana”一词来源于巴利文，意为“圣者教义发光之所”。此处佛教遗址经历了从公元3世纪至公元

〔图十五:1〕Oya1



〔图十五:2〕



〔图十六〕Jaff1



10世纪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时期，以3—4世纪和6—8世纪为两个发展高潮期，最晚的建筑下限可延续到公元9—10世纪<sup>〔1〕</sup>。其中，著名的吉特瓦纳大佛塔创建于公元3至4世纪〔图十七〕，而遗址内一批著名的佛教寺院则主要建立于公元6至8世纪，随后在公元9至10世纪寺院不断的扩建，下限止于公元10世纪末。此后，这处佛教圣地又经历了不断的维修工程，从而给遗址的断代带来很多困难。由于目前对遗址内出土的全部遗物进行的编年、分期工作了解不多，所以只能初步断定考古发掘出土的佛足迹石，上限在公元4世纪，下限不超过公元8世纪。

目前保存在吉特瓦纳遗址博物馆内的两方佛足迹石的相关说明文字上，也笼统地记载其年代为“公元4—8世纪”，当是取自上述年代范围。我认为这一年代范围结合历史背景来看，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由此也可以将其作为该遗址内的Jet1—Jet5等其他各方佛足迹石断代的参考数值。不过，Jet6的情况较为特殊，有必要提出来专门加以讨论，后文将作详说。

阿布亚吉里 (Abhayagiri) 遗址在《法显传》中又译为“阿跋耶祇厘”，梵文意译为“无畏山”，位于阿努罗陀补罗的城北，所以也有“北寺”之称。此寺据称是公元前89年瓦腊干跋 (Valagamba) 国王为纪念他的恩人摩诃帝沙长老所创建，公元2世纪又经过扩建。公元312年，当佛牙舍利从南印度辗转传入斯里兰卡之后，首先被安奉于此寺供人瞻仰，此地自此成为著名的佛教圣地<sup>〔2〕</sup>。我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法师在斯里兰卡巡游期间，曾于此寺修行两年。法显在其所著《法显传》“师子国”条下记载：“于王城北迹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银装校，众宝合成，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sup>〔3〕</sup>他还亲眼目睹了在无畏山精舍进行的“佛齿巡游”场景：“却后十日，佛齿当出至无畏山精舍，国内道俗欲殖福者，各各平治道路，严饰巷陌，办众香华、供养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夹道两旁，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拏，或作睽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彩画庄校，状若生人。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佛堂上。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sup>〔4〕</sup>从中可见无畏山寺佛教当时的盛况之一斑。位于遗址中心稍北的无畏山寺大塔，据斯里兰卡文献记载，始建于国王Valagamba和国王Gajabahu时期（公元122—134年），当初的规模并不大，但随后不断扩建，工程一直延续到12世纪<sup>〔5〕</sup>。按照法显的说法，大塔的建立和“佛欲化恶龙”也有关系：“佛至其国欲化恶龙，以神足力，一足蹶王城北，一足蹶山顶，两迹相去十五由延，于王城北

〔1〕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The Cultural Triangle of Sri Lanka*, Unesco Publishing/CCF, 1993, pp.64-85.

〔2〕 何道隆主编：《当代斯里兰卡》页278—27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东晋) 沙门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页128，中华书局，2008年。

〔4〕 前揭 (东晋) 沙门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页131。

〔5〕 T.G.Kulatunge, *Abhayagiri Vihara at Anuradhapura*, Ministry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lombo, 1999, p7. 但我国学者章巽则认为此处的“大塔”应指斯里兰卡古代国王杜多伽摩尼所建之大塔，并推算此王在位年为公元前101—77年，参见前揭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页127，注释4。



迹上起大塔。”<sup>43</sup>

〔图十七〕吉特瓦纳佛塔

目前保存在无畏山寺纪念馆廊道内的四方佛足迹石，均有说明文字，其中Abh1、Abh2、Abh4均标示其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只有Abh3标示为“年代不详”。笔者认为从遗址的历史背景、建筑史以及佛足迹图像在南亚地区兴起和流行的时间等因素综合考虑，这几方佛足迹石是否可能早到“公元前3世纪”，是值得怀疑的。



其一，按照唐代玄奘在《大唐西域》的记载，斯里兰卡佛教的传入是在佛去世后的第一个百年里，由印度阿育王的弟弟摩醯因陀罗（Mahinda）传入的<sup>42</sup>，这个说法与斯里兰卡巴利文语文献的记载相一致，只是说摩醯因陀罗不是阿育王的弟弟，而是阿育王的儿子。王邦维先生认为这个传说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大致可以相信<sup>43</sup>。但是，佛教传入斯里兰卡，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佛足迹崇拜和相关的图像也随之传入斯里兰卡了呢？现有资料表明，在公元前后，中印度的巴尔胡特（Bharhut）、桑奇（Sanci）以及东南印度的阿玛拉巴提（Amaravati）、纳格朱纳康达（Nagarjunahonda）等地，以佛塔作为载体，才开始出现象征佛陀的菩提树、台座、车轮、伞盖和佛足迹等图像<sup>44</sup>。但东南印度的佛足迹图像要明显滞后于中印度，其年代大多集中于公元2—3世纪。所以，如果佛足迹图是从东南印度再传到斯里兰卡，其年代就不大可能早于中印度和东南印度佛足迹石最初出现的年代，中间还需要一段传播的时间。

其二，佛足迹在斯里兰卡的流行，如同前人研究所指出的那样，通常是放置在佛塔的四方或四方中的某几个部位，多置于佛塔或佛殿的拜殿前面，以供佛教信众顶礼膜拜<sup>45</sup>。前节所述斯里兰卡国家考古局主持发掘的Oyamaduwa佛教遗址内出土的佛足迹石，从其出土位置上看，也印证了这一情况。所以，

〈1〉 前掲（东晋）沙门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页127。

〈2〉 （唐）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十一“僧伽罗国”条下“佛教二部”，页878，中华书局，1985年。

〈3〉 王邦维：《佛牙的故事》，《文史知识》2015年第1期。

〈4〉 前掲李静杰《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

〈5〉 前掲李静杰转引日本学者丹羽基二《圖說世界の佛足石——佛足石から見た佛教》所论，详见《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

〔图十八〕无畏山佛塔



斯里兰卡早期出现的佛足迹石，不太可能作为孤立的佛教崇拜物先于佛寺、佛塔而流行，而很可能是与佛寺、佛塔同时出现，并作为其附属物而存在。如此推测，按照斯里兰卡本地的传说和记载，无畏山佛塔的始建年代最早也是在公元2世纪，作为以佛塔为依附和载体的佛足迹石，似乎也不太可能先于佛塔而单独出现在公元2世纪之前〔图十八〕。

其三，我国东晋高僧法显曾在五世纪初在无畏山游学，他对于佛

足迹石之类的圣迹是十分关注的，在其求法途中，他曾记录了途经“乌菴国”时所闻佛足迹等事项，“传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国已。佛遗足迹于此，迹或长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度恶龙处，亦悉现在，石高丈四，阔二丈许，一边平”<sup>〔1〕</sup>，这也是我国西行求法僧人对佛足迹最早的记录。但有趣的是，他对斯里兰卡佛足迹情形的描述却带有十分夸张的色彩——“佛至其国欲化恶龙”，并没有具体图样的描绘，这与后世唐代高僧玄奘等人所观察记录的印度中天竺“摩揭陀国”佛足迹石丰富详细的文字大不相同（详见后文）<sup>〔2〕</sup>。这个现象或许也可以旁证，当时斯里兰卡虽然已经有了关于佛足迹的传说和信仰，但尚还处于早期流传的阶段，如果真的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在无畏山寺出现了大量佛足迹石的实物，法显在他于此巡游两年多的时间内，是不可能不加以留意和记录的。

所以，综合上述分析，并且结合与之相邻的吉特瓦纳（Jetavana）遗址出土佛足迹石的年代加以考察，笔者认为将阿布亚吉里（Abhayagiri）遗址（无畏山）所出佛足迹石的年代大致比定在公元2—4世纪或许较为合理。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上述佛足迹石的类型及其相对的早晚关系。从形态、纹饰等方面观察，我们可以将上面的佛足迹石划分为A、B、C、D四种大的类型：

A型：为图案最为复杂的一种类型，佛足迹石上没有出现立柱、华盖等纹饰，但足掌中和周边图案却十分复杂多样，掌中或后跟刻有轮辐纹，掌心周边开始出现“三宝标”以及双鱼、宝瓶、海螺等图案纹饰。如上述Abh3、Abh4、斯国博1、Jaff1等各例。

〔1〕 前揭（东晋）沙门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页28。

〔2〕 前揭（唐）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八“摩揭陀国上”条下“如来足迹石”，页633—634。



**B型**：足掌中央有轮辐纹，有的也有华盖和立柱。根据其他装饰纹样的有无，也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佛足迹中央刻有立柱和华盖，同时在足掌中央刻出一个较大的轮辐纹。如上述Jet2、Jet5两例。

**Bb型**：佛足迹当中没有立柱与华盖纹，仅在掌心出现轮辐纹，如上述Abh1、Abh2两例。

**C型**：佛足迹与华盖纹相结合，最大特点是足掌上没有出现轮辐纹。这类佛足迹石所占比例较大，根据佛足迹与华盖纹饰的形制特点，又可划分为两个亚型：

**Ca型**：佛足迹中央出现立柱，上承以华盖，华盖的样式较为简略，没有缨络等装饰物，如上述Jet1、Jet4、斯国博3、斯国博4、斯国博6等例。

**Cb型**：佛足迹中央的华盖有附属的装饰物，或在顶盖两侧出现升起的花蕊，或在华盖顶两边有下垂的花蕾，如上述Jet3。

**D型**：只有简单的一双佛足迹，没有其他任何装饰性纹饰或图案。如上述斯国博2、斯国博5、凯大1、Oya1等各例。

此外，如前所述，Jet6不是单独的佛足迹石，而是出现在建筑物构件上的佛足迹图像，不应当归入上述各类型考虑。目前所知在佛教美术中出现的佛足迹图像，一开始都并非单独出现，而是以佛塔、佛寺等作为载体出现在建筑物的立柱、门栏、横梁等装饰性图案中，如公元前后在中印度和东南印度的一些佛教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这类佛足迹图像。公元2—4世纪之后，佛足迹图像才作为一种独立信仰而确立，开始出现单独的佛足迹图像<sup>〔1〕</sup>。Jet6是一件雕刻在石质建筑构件上的佛足迹石图像，它是否也属于比较早期的刻在佛寺、佛塔建筑构件上的佛足迹图像不得而知，但如果从吉特瓦纳遗址的总体年代来看，笔者推测Jet6大体上也应与这个时期佛塔、佛寺的主体建筑年代相同，不会早到公元前后，而很有可能仍为公元2—4世纪左右的遗存。从构图特点上看，Jet6的佛足迹上方有华盖覆盖，这已是具有斯里兰卡地方性特色的佛足迹石图案纹饰，它只能是在接受了来自印度的佛足迹图像，并且在斯里兰卡融入了本土元素之后，才会产生出的新样式。

那么，上述各个类型的佛足迹石之间，是否也存在着相对的早晚关系呢？这是我们无法回避但却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由于缺乏与之相关的考古背景资料，加之作为其载体的佛塔、佛寺通常都经过不同时期的扩建或者修葺，年代的上、下限跨度都比较大，很难将其精确地定位在某个具体的年代框架之内，因而只能结合佛教遗址的情况，将其放置到一个相对宽泛的年代范围之内来加以考虑。

在A、B、C、D四型当中，A型目前主要发现于古都阿努罗陀补罗境内的阿布亚吉里（Abhayagiri）遗址（无畏山）和北部的贾夫纳、瓦武尼亚（Vavuniya）等地，这是四型佛足迹当中图案最为复杂的一型，与之最为接近的图案题材和样式，在东南印度的阿玛拉巴提（Amaravati）、纳格尔朱纳康达（Nagarjunahonda）等地2—4世纪的佛足迹石中可以见到，这表明斯里兰卡的佛足迹图像很可能是从东南印度传入。此次

〔1〕 前揭李静杰《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

调查中发现斯里兰卡西北部的贾夫纳考古博物馆中所见出土于Kathurugda Ancient Vihara佛教遗址中的佛足迹石，在地理位置上最靠近东南印度，也属于A型，应为此类型佛足迹石较早从东南印度传入到斯里兰卡西北部的证据之一。所以，再结合前述吉特瓦纳佛寺的始建年代等综合因素，笔者认为可以将A型佛足迹的年代初步定在公元2—4世纪前后。

B、C两型的佛足迹图像的共同特点，是图案相对较为简单，有的在双足掌心刻有轮辐纹，有的在双足之间刻有立柱加华盖纹，而后者具有斯里兰卡的地方特点，少见於印度等地的佛足迹图像。此外，这两型通常不见A型佛足迹石上的“三宝标”以及双鱼、宝瓶、海螺、绦索、宝剑等图案纹饰（当然，也不排除因石质风化剥蚀而导致图案漫漶不清的可能性）。这两型佛足迹石在斯里兰卡古都阿努罗陀补罗境内两处最为重要的佛教遗址吉特瓦纳（Jetavana）和阿布亚吉里（Abhayagiri）中都有发现，数量也相对较多，表明其流行时间较长，最为集中的年代很可能是在公元4—8世纪前后。

D型的佛足迹图像最为简单，仅有一双佛足迹，没有其他任何装饰性图案或纹饰。但这是否意味着它的出现年代最晚，还不能断定。在阿努罗陀补罗各地遗址当中，已经存在着这类佛足迹石，说明它的年代与上述各型之间不一定存在着相互早晚的关系。

过去日本学者丹羽基二将斯里兰卡的佛足迹石分为无纹简略型、无纹加伞盖型、刻画法轮型、刻画法轮加伞盖型、长脚趾型、多种纹样型、网格纹样型等7种类型，并且推断它们之间“呈现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演变关系”。李静杰先生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很可能在斯里兰卡最早出现的多种复杂纹样的佛足迹图，最初都是由东南印度传来，尔后随着佛足迹石的大量制作，图样刻画便趋向简略，并不存在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关系<sup>〔1〕</sup>。通过上述类型的排比分析，我总体倾向于认同李静杰先生的观点，但需要略作补充，即：上述各型佛足迹石当中，A型在斯里兰卡出现的年代可能较早，随之而来的是具有斯里兰卡地方元素的B、C两型，与上述三型大致同时，D型实际上也开始出现，各型之间有相长当的流行时段可能是彼此重叠的。之所以出现图案纹饰简化的佛足迹石，一方面如同李静杰先生所言，可能与佛足迹石的大量流行之后，图案纹饰有简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这或许也与作为佛足迹石载体的佛塔、佛寺的不同等级有关。前引斯里兰卡国家考古局主持发掘的Oyamaduwa佛教遗址内出土的佛足迹石，就可能属于这种情况，它出土于该遗址内一处小型佛塔前的踏道一侧，等级不高，远不能与吉特瓦纳（Jetavana）和阿布亚吉里（Abhayagiri）这样著名的佛寺相比，因此所采用的佛足迹石品级也较低，图案纹饰简陋许多。

## 四 斯里兰卡佛足迹石与中国的关系

斯里兰卡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法显传》中记载法显曾在阿布亚吉里（Abhayagiri，无畏山）

〔1〕 前揭李静杰《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



的精舍中见到“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sup>1</sup>。《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师子国”条下也记载“晋义熙（公元405—418年）初，始遣使献玉像，经十载乃至”<sup>2</sup>。同书又载大通元年（572年），“（师子国）后王伽叶伽罗诃梨使奉表曰：谨白大梁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今奉薄献，愿垂纳受”<sup>3</sup>。那么，既然中斯两国早在公元5—6世纪就有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往来，斯里兰卡佛教美术史上所流行的这些佛足迹图像，是否也有可能曾经传到中国呢？

比较东晋僧人所撰写的《法显传》和后世的唐代史料中所涉及到的佛足迹图像，给笔者的一个初步的印象是：法显虽然在斯里兰卡也注意到了佛足迹，但却并没有将其图像直接拓写回中国。直到唐代，方才有玄奘、王玄策等大唐求法僧人和官方使节从印度中天竺的摩揭陀国、鹿野苑等地将佛足迹图像拓写回中国<sup>4</sup>。

在唐代的史料中，记载中天竺和龟兹国等地佛足迹的文献有若干条，主要见于《法苑珠林》、《释迦方志》、《大唐西域记》和《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典籍之中。如唐代僧人道世《法苑珠林·感通篇·圣迹部》卷二十九条下载：“在王舍城山北倚东……故宫北石柱高数丈。昔无忧王作地狱处……石柱南有大塔，即八万四千之塔一数也，安佛舍利一升，时有光瑞……其侧精舍中，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望摩揭，故蹈石之上之双足迹，长尺八寸，广六寸，轮相花文，十指各异。近为恶王金耳毁坏佛迹，凿已还平，文采如故……贞观二十三年有使图写迹来。”<sup>5</sup>又如唐玄奘法师所著《大唐西域记》一书中，在《摩揭陀国》条下，对于“如来足迹石”也曾有过十分详细的记述：“窣堵波侧不远，精舍中有大石，如来所履，双迹尤存，其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两迹俱有轮相，十指皆带花文，鱼形映起，光明时照。昔者如来将取寂灭，北趣拘尸那城，南顾摩揭陀国，蹈此石上。”<sup>6</sup>这些唐人的记载比起东晋僧人法显的，更具细节，描述也更加丰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玄奘曾将从“摩揭陀国”拓写回的佛足迹石图像供奉于陕西铜川玉华寺<sup>7</sup>，而唐使王玄策也从将“鹿野苑”拓写回的佛足迹石，先供奉于京城长安的普光寺，后来辗转传播到日本药师寺<sup>8</sup>。这些佛足迹石上，都刻有“轮相”，十指上带有花文，还有“鱼形”等其他纹饰，与唐人文献记载的情况十分相仿。所以，至少可以认为，唐代玄奘和王玄策是曾经亲自观摩和组织拓写过佛足迹石图像并带回国内的。

〈1〉 前揭（东晋）沙门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页128。

〈2〉 《梁书》卷五四《诸夷》，页800，中华书局，1973年。

〈3〉 前揭（唐）姚思廉撰《梁书》卷五四《诸夷》，页800。

〈4〉 霍巍：《王玄策与唐代佛教美术中的“佛足迹图”》，未刊稿。

〈5〉 （唐）道世：《法苑珠林》页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6〉 前揭（唐）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页633，中华书局，1985年。

〈7〉 卢建国：《陕西铜川唐玉华宫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6期。

〈8〉 霍巍：《与唐使王玄策事迹有关的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几个问题的补识》，《九州学林》2006年夏季四卷二期，页310—334。

从唐人的文献记载和现存的唐代早期佛足迹石的图案、纹饰来看，与斯里兰卡北部贾夫纳、古都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各遗址当中所发现的A型佛足迹石的基本一致，其共同特点为佛的足掌中央或后跟部位刻轮辐纹，十指上刻各色花纹或符号，另在足掌和足跟周边位置刻出三宝标、宝剑、双鱼、宝瓶、海螺等图案纹饰。只是中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佛足迹石都是唐代的遗存（公元7世纪），在流行年代上较斯里兰卡要更为晚些；从传播路径而论，很可能是经由玄奘、王玄策等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而可以基本排除和斯里兰卡之间存在着直接传播的关系。

不过，中斯两国这类最具共性的佛足迹石图像的存在，也证明了一个潜在的事实，即它们都可能具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印度中天竺摩揭陀国内的王舍城、鹿野苑等佛教圣地，而这一类标识性很强、图案纹饰复杂、佛教象征元素齐全的佛足迹石，很可能也是在中天竺独立出现的最具象征意义、流行年代最早、影响地域最广的一类佛足迹石图像，然后以此为中心，向南方和北方分别传播扩散到南亚、东亚各国。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何 芳）



---

## On The Ages of The 'Xixia Caves' in Dunhuang

Liu Yongze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04 to 014.*

**ABSTRACT:**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ages of Mogao caves 409, 65 and Yulin cave 39 in Dunhuang by the inscriptions concerned, reaching the different judgement: Mogao cave 409 got reconstructed by the commission of Alsrhan Khan of Xizhou Uighur in the lat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stead of the Western Xia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of Yulin cave 39 was supported by the royal family or the high-ranking officials of Xizhou Uighur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Mogao cave 65 was rebuilt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stead of the early Western Xia period as the result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angut inscriptions and the layers of the repaired murals of the cave.

**KEYWORDS:** the Western Xia; cave 409; cave 65; Xizhou Uighur;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 A Survey of The 'Carved Buddha Footprints' in Anuradhapura of Sri Lanka

Huo Wei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15 to 030.*

**ABSTRACT:** Sri Lanka occupie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long the spreading route of the carved Buddhas footprint with its large number and popularity of the carvings with the unique design and style.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xcavated objects in the 4<sup>th</sup>-8<sup>th</sup> Buddhist temple ruins in Anuradhapura and the rare materials availab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this design in the Buddhist cultural context in Sri Lanka aiming for the source and approaches of such Buddha footprint images into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the Silk Road; Buddha footprint image; Buddhist archaeology; Buddhist art; Sri Lanka

---

## On The Local-Styled Buddhist Sculpture in Guanzhong Area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merica] Chang Qi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31 to 046.*

**ABSTRACT:** While following the design of the Buddha images from the capitals Pingcheng (present Datong) of Shanxi Province and Luoyang of present Henan province, the artists of Guanzhong (in present Shaanxi province) of the Northern-Wei dynasty developed the Buddhas with the local styles --- the close incised carved lines presenting the drapery folds of the gown, the transformed gown of the Buddha sculptures from Pingcheng and Luoyang. They also created the Han-styled costume with two collars crossed as well. Such local-styled Buddha sculptures were popula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6<sup>th</sup> century, during which they were enshrined together with the Buddhas sculptures of the orthodox image originating from Pingcheng and Luoyang, the Buddhist center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transformed Buddha images paralleled the local people's aesthetics pursuits for artistic diversity of Buddhist image of that time. Many Buddha sculptures in the close-incised-lined-carving gown are found in the north of Guanzhong area covering the northern Shaanxi, southern Ningxia and eastern Gansu provinces, only a few crossed-collared Buddha sculptures appear just in Guanzhong whereas. It